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文化研究

如何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马戎

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

王建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家乐」

谢燕清

建筑的「亭」与「堂」在宋代的社会意义

谢晶

中国的文化使用

玉梦舍

差序正义与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赵旭东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田



天



CHINA STUDIES **No.16**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2012年秋季卷总第16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研究. 2012 年. 秋季卷: 总第 16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97-5005-6

I. ①中… II. ①周…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
研究—中国—现代—丛刊 IV. ①D66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489 号

中国研究 (2012 年秋季卷总第 16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胡庆英 谢蕊芬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爱华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285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005-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 远
周海燕
秦 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具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

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中国研究

2012 年秋季卷

总第 16 期

目 录

发刊词 / 1

主题研讨：文化研究

如何思考 21 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马 戎 / 1

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 王建民 /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家乐”

——都市中产阶级的民俗趣味 谢燕清 / 34

建筑的“亭”与“堂”在宋代的社会意义 谢 晶 / 50

中国的文化使用 玉梦舍 / 67

学术论文

差序正义与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赵旭东 / 93

“东亚奇迹”与“需求响应”经济的兴起 高承恕 / 120

舒适的政治学：都市中产阶层和北京商品

房业主的体验研究 朱蒂丝 / 147

家庭价值观变迁：去传统化？去集体主义化？ 徐安琪 / 171

华南丝区的变迁

——广东南海民乐地区的个案研究 杨小柳 / 200

书评与随笔

“社会契约”变迁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从唐文方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说起 ... 何 森 / 214

“逃离”政治与依附权力

——中国的新商业精英与国家的关系 苏媛媛 / 228

英文目录与摘要 / 241

稿 约 / 247

如何思考 21 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马 戎^{*}

摘 要：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发展”作为会议的主题，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下做出的非常具有世纪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跨文明对话；另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传统（如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在交往与相互学习过程中如何构建和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关键词：文化发展战略 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话 中华文化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发展”作为会议的主题，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中央在当前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下做出的非常具有世纪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在农村和城镇的所有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创新改革，通过对外开放让中国参与到国际贸易市场中，经过全体国民持续不断的发奋努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公有制体系已经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社会内部就业和分配机制转型

^{*} 马戎，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暨社会学系教授（marong@pku.edu.cn）。

使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与矛盾逐渐显现。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外交关系，同时中国也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稳定繁荣与世界的稳定繁荣已密切联系在一起。21 世纪是人类社会自工业化以来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去殖民地化和“冷战”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需要考虑在原有意识形态凝聚力逐渐淡化的新一代国民中如何建立政治与文化认同与凝聚力，考虑如何在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力促出现“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的局面。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文化发展战略这个深层次“务虚”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开始超越协调国内群体间经济利益和国际外交方针这些操作性策略，成为国人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宏观战略问题。

要思考中国在新世纪的深层次的文化发展战略，首先必须认清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大形势即全球政治与文化格局，认清国内社会发展依然面临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社会客观现实来为中国的发展思考和选择一条合理而又现实的路径。由于这个客观世界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国际政治格局瞬息万变，国内代际更替不容忽视，许多原来成功的做法逐步失效，时过境迁，我们必须不断密切注视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认识和发展策略。如果我们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坚持“两个凡是”的因循守旧思维方式，那么就只能使中国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中陷入重重被动的地位并情势日蹙。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跨文明对话。为了使这样的对话取得积极的效果，我们需要挖掘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具有的共性，分析并确认这些共性，使之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和建立共识的基础，同时向对话的其他国家介绍中华文明的特性，争取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在平等交流和善意对话中推动良性互动，逐步消除和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不断消减历史（如“冷战”和边境冲突）遗留下的敌意，增强政治互信。另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传统（如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在这一层面也需要挖掘中华各群体在几千年交往中交融共享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明确大家共同的共性，尊重彼此的特性，坚持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在互相学习、吸收彼此长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加强“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文化格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自信、繁荣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国家。

本文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分别探讨今天我们在设计中国文化发展发展战略时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 中国在 21 世纪如何开展国际跨文化对话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既不是苏联解体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冷战”模式，也不是中国一度强调的“三个世界”模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工业化国家为第二世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使美国居于“一家独大”的超强霸主地位，俄罗斯成为与中国、印度、巴西为伍的“金砖四国”，随着经济增速的减慢，高福利财政负担和复杂的移民问题开始困扰欧盟各国，特别是 2008 年以来持续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对原来的国际经济板块进行重组。因此，我们必须对国际新形势的整体格局做出判断，并深入分析今天有哪些因素影响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各国之间的交往、“结盟”与冲突？

1. 如何理解亨廷顿关于国际政治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分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他对国家冲突的新模式给予了精辟的总结。

第一，“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限来区分自己，意味着……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他认为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而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已退居其次。

第二，“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这表示非西方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后将会出现更强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本土化”，这些国家将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并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极力维护本国尊严和保护自身利益。

第三，“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教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换言之，基督教国家的文

化传统即是以其他基督教国家为“盟友”，而以非基督教群体和国家为“敌人”，在对外关系上采用“双重标准”。

第四，“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正是由于文化冲突无法通过讨论和妥协来解决，这就使得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的文化冲突无法化解。

第五，“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他因此断定：“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也促进了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亨廷顿，1999：133～135）

概括地说，亨廷顿认为人们（他讲的主要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在竞争中“需要敌人”，也需要“盟友”。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将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导。“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亨廷顿，1999：129）

亨廷顿上述观点发表后在世界各国知识界和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观点代表的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基本思维定式，如果全面和客观地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并深入理解新世纪的国际关系，其中有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商榷。

第一，他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确实超越了意识形态集团（如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如他描述的发生在南斯拉夫和中东地区基督教群体和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但是在许多场合，意识形态差异依然是影响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形态”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社会至今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仍然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敌手”，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朝鲜、越南和从这一传统中脱胎并具有回归这一传统倾向的俄罗斯，仍然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不能信任、时刻防范并伺机加以削弱的国家。同时，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70 亿人口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使各国在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自然资源（矿产、水

产品、农产品) 和商品销售市场等方面都面临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中国东海、南海的领海之争, 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的北冰洋之争, 非洲资源开发权益之争等, 都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 21 世纪, 经济利益成为影响各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 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因素与文化传统一样,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必须根据每个案例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笼统地过分强调“文明冲突”的作用。

第二, 在全球化进程中, 强国通常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与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获得利益, 真正平等的外交和真正公平的贸易只是停留在外交辞令中, “弱国无外交”。例如, 美国在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 基本上是“想打谁就打谁”, “想制裁谁就制裁谁”, 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准则都让位于“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形势下, 各国维护本国尊严和利益的诉求必然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进行反弹, 而西方文化在外交强权、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蔓延到其他国家后, 也必然引发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维护本土文化的“本土化”文化运动。亨廷顿看到了这一趋势, 但他认为这只是由于在“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 忽视了东西方之间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等态势。其实, 各国的本土文化运动只是面对外来文化强力冲击的被动反弹, 这是各国保护本民族“文化权”的自卫行动。世界过去一直是, 今后也将继续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 以美国文化或基督教文化来“同化”全球所有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 亨廷顿归纳了七种基本的“文明”形态(亨廷顿, 1999: 29~32), 他把各种“文明”看作边界清晰、彼此对立的板块, 这是把“文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我们不应把各国文化看成是彼此隔离和固定不变的东西, 因为各民族、各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适应环境变化、结合本土自发产生和族际交往两个方面的一个动态和辩证的历史进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中东地区, 在形成过程中彼此影响, 其经典故事和诫训中充满了彼此借鉴的内容, 这些宗教后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竞争形成的儒家学说、道家、法家等世界观和伦理观, 后又先后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欧亚大陆各方的多种文化因素。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传播工具的发展, 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仔细剖析各种文化与文明, 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文化学习与交融。也正是

这些融汇在不同文明中的共同文化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相互对话与和谐共处的文化基础。

第四，亨廷顿揭示出基督教国家在与非基督教国家交往时持一个“双重标准”的态度，这倒是一个值得赞许的诚实态度。他特地举出华人的例子：“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亨廷顿，1999：134）当然，客观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如台湾有相当比例的华人并不认同这一点，这在近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展示得非常清楚。我们一直明确反对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采用“双重标准”，但是同时，亨廷顿指出现象也值得中国人加以警惕。在现代国家，公民身份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中国政府和民众在与华裔外籍公民交往中，切记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以为某某人有华裔血统，他必然认同或者应该认同中华和中国的利益，这是大错特错，这不但会误导自己的判断，还会引发其他国家对华裔的排斥和对中华文化的反感。

第五，亨廷顿认为“讨论和妥协的方式”可以用来解决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物质利益的分歧，但是“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这一观点需要商榷，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形式和内涵，如果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可以讨论，那么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应当可以对话，也可以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和妥协。否则，文明间的冲突就会成为“死结”而只能诉诸流血和相互毁灭了，这不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西方文化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原则为主导的排斥型文化，而人类社会还有其他文化形态，在处理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上采用不同于西方的策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主张中庸之道、尊重并且重视借鉴其他文化、反对将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应用极端化的儒家传统，和将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己收容进自己的体系并赋予它们恰当地位以求得社会和谐和文化的藏传佛教传统。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恰恰反映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

第六，亨廷顿认为在精神层面“人们需要敌人”。但是，这并不是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持有的共性。相比之下，佛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似乎没有这种“寻找和树立敌人”的处世逻辑。为什么这两种宗教需要在世界上树立“敌人”？亨廷顿的解释是因为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

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亨廷顿，1999：232）。这一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人在全世界推广基督教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宗教热情。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有一定的文化影响，但是似乎从来没有这种传教般的热情，通常是周边群体派人（如日本“遣唐使”）来中原学习中华文化。中国向日本和朝鲜半岛传播过佛教，但是佛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由于佛教和中国道教都不是一神教，所以它们的传教热情有限，也绝对没有把非信众和其他宗教信众视为“异端”而拒斥。儒家思想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是宗教，只是一种世界观和伦理学说。儒家学说几千年来占据着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这即是各种本土信仰和外来宗教都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和平共存的文化环境。

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比较亨廷顿的观点，很容易看到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实际上，他的这种局限性也是我们认识自身文化局限性的一面镜子。由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他对文化因素在新时期国家关系中重要性的强调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他的这些观点，认真思考如何在新世纪建设中华文化并在国际外交中发挥文化交往的作用。

2. 努力为中国的国际交往寻求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

在 21 世纪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影响因素中，既有自“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各国本土民族主义因素，有资源争夺和贸易方面经济利益的因素，也有不同文化传统造成的“我们”和“他们”的认同差别所带来的感情因素。亨廷顿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在新世界政治格局中“文化”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此中国确实有必要制定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

我们这些年来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建设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局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也在刻意突出一个“和”字。但是这一模式的前提还是“不同”。对于各国之间存在的“不同”，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互让互谅来促成一种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可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指的是同在一个文化系统内部，人们在求道（君子）和逐利（小人）的取舍不同导致人际关系的差异。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一思路延伸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交往中，但是必须关注各自文化基础的差异性。可能其他文化会以逐利的方式来求他们文化中的“道”，而不会把“求道”与“逐利”对立起来，所以会善于理解和把握“不和”，而不善于理解和把握“不同”，甚至不能理解和承认“不同”却能“和”这样一种关系现象。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体系具有深层次的不同的

文化基础，各自的基本价值观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很可能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变得遥不可及，中国人提倡的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为了真正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把功夫下在如何消解这个“不同”上，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和”。

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指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我们的对话，使其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眼前的利益，而更多地包括共享价值观。……（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这使得我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我们很难拥有共享的价值观，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随着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找到我们两国价值观当中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双边关系必然还是面临一个上限，很难飞得更高。……怎么样识别出共同的价值观，怎么样用它们来巩固两国的关系，怎么用它们在一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点，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希望我们能够在寻求共同价值观方面有更大的进展”（周志兴、段醒予，2011：45，46）。他的这段话点出了中美外交中最基础的核心命题：找到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在各国精英与民众心目中缺乏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认同，那么彼此的戒心和防范之心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通过外交途径宣布建立的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外交辞令和彼此的敷衍，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政治互信和对他方利益的关注。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在中国和我们的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国家（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洲等）之间逐步增加和构建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同”，在找到文化（价值观）共同点的基础上推动互动中的“求同存异”，以“和”为主线和基调来协调其他方面的“异”。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承认中国与其他各国（如美国）在文化方面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而不应过于强调彼此的“不同”，从而自己在理论上把这条沟通文化和建立互信的渠道封死。

3.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共性是客观的现实

“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曾经在国内引起一些讨论。“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指全世界大多数人具有基本共识、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如果我们简单地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也就认定“跨文明对话”不可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那么，“跨文明对话”也就必然成为缺乏共识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实际利益的博弈，这样的对话将徒具“对话”的形式，不可能形成